

唐代

文学百科

辞典

卞孝萱 主编

TANG DAI WEN XUE BAI KE CI DIAN



I2062-61
B444

唐代文学百科

辞 典

BAI KE CI DIAN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学百科辞典/卞孝萱主编. —上海:汉语
大词典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432-0834-2

I. 唐... II. 卞... III. 古典文学—中国—唐
代—辞典 IV. I206. 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164 号

责任编辑 陈福畴
装帧设计 钱自成
技术编辑 徐雅清

唐代文学百科辞典

卞孝萱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照排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7 字数 1969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100

ISBN 7-5432-0834-2/I · 152

定价: 20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135113

顾问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罗宗强 周绍良 周勋初 周祖譔 钱仲联 傅璇琮

主编

卞孝萱

副主编

乔长阜

编委

李生龙 吴在庆 吴企明 张明非 张清华 张锡厚 陈耀东
金涛声 贾晋华 黄进德 程有庆

撰稿人

于景祥	马积高	王达津	王志昆	王步高	王骧	尤振中
毛水清	卞孝萱	邓绍基	左江	卢燕平	丘任	冯春生
巩本栋	朱金城	乔长阜	刘乃昌	刘学锴	刘维治	羊春秋
安旗	许永璋	许总	孙昌武	苏者聪	李云逸	李生龙
李立朴	李菁	杨军	肖占鹏	肖峰	吴小平	吴丹雨
吴文治	吴在庆	吴自奋	吴企明	吴鹏	吴翠芬	余恕诚
沈利华	张长霖	张弘	张伯伟	张生	张浩东	晶英
张锡厚	陈书录	陈东林	陈伯海	陈娴	陈耀东	张林
郁贤皓	欧明俊	罗时进	罗宗强	金性尧	陈声	周建国
周绍良	周振甫	郑文	郑庆筠	单滨	陈涛	屈守元
赵守俨	赵晓兰	荀文	段子宜	新颐	日晰	姜光斗
姚松	姚继舜	袁行霈	莫励锋	饶宗华	房青	姜光斗
倪培翔	徐敏霞	高利华	郭子建	陶敏	复生	钱仲联
梅新林	敏泽	阎琦	梁超然	葛庆	进德	萧涤非
景凯旋	程千帆	程有庆	程章灿	傅璇琮	葛恒	蒋寅
詹瑛	谭优学	谭佛维	缪钺	潘慎	鲁永良	谢荣福
魏明安						薛天纬

前 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一度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繁荣的封建经济，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的长期安定，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国家统一，水陆交通发达，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唐代人民富有民族自信与雄大魄力，对一切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域外音乐、舞蹈、美术等，纷纷传入。西方的景教、波斯的摩尼教和祆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都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固有文化因摄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而更具活力。唐统治者并用儒、释、道，容纳诸子百家学说，使儒家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减弱，人们的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唐代实行科举制，进士科试诗赋，对诗歌的兴盛，产生了促进作用。唐代政治较开明，统治者奖进诗人，士人们处在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社会环境、政治氛围中；妇女在行动上受到的限制也较少一些；都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所有这些，都起了启迪人们心智，激发人们创造力的积极效果。

根植于这种社会沃土中的唐代文学，在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又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规模空前的百花盛放的景象。就文体现言，近体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代文学的主要文体，小说、文论、译经取得了新的进展，还出现了曲子词、变文、俗讲等新文体。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新时代，创立了新型古文。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言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文学成绩辉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至为巨大。古今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所说：“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有鉴于此，编纂一部有关唐代文学的大型工具书，以供广大喜爱、研究唐代文学的读者参考利用，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编者约请专家学者，各就其所长，撰写辞条，由于得到众多的老、中、青同行的热情支持，经历多年，终于编成此书。

目前已经问世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辞典，多为专题性的，本辞典则为综合性的，其内容和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举其要者有：(1)通论、专论、民间歌谣谚语三大类，为本辞典所独有。(2)群体流派、曲名词牌、体裁作法、名词术语四大类，本辞典所收辞条，较其他辞典为多。(3)作家、名篇两大类，本辞典既吸收了其他辞典的优点，又有所补充。(4)本辞典在唐人著作大类中，区分为总集、别集、诗话、文论、笔记、杂著及小说集等小类。(5)本辞典对前人有关唐代文学的直接、间接成果，区分为研究著作、参考书两大类。(6)本辞典下限为辛亥革命（详见“凡例”），鉴于敦煌文学兴起于辛亥革命后之特殊性，特专设敦煌文学大类。总之，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信息量大的、覆盖面广的《唐代文学百科辞典》。

值此出版之际，我们竭诚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改补充，使其更臻完善。书中图版，系据有关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珍本复制，在此谨致谢意。

凡例

(一) 本辞典包括总论、专论、群体流派、作家、著作、名篇、敦煌文学、民间歌谣谚语、曲名词牌、体裁作法、名词术语、研究著作、参考书十三大类，举凡唐五代文学所涉及的知识门类，大体包罗在内。

(二) 本辞典仿清代《全唐文》、《全唐诗》体例，统收唐代及五代十国作家、作品。

(三) 作家大类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两种人。主要收录有作品存世者。虽无作品存世，但曾经取得一定成就者，也酌予收录。

(四) 著作大类包括总集、别集、诗话文论笔记杂著、小说集四小类。总集类包括唐五代人所编及后代人所编两部分。唐五代人所编者，力求其全；后代人所编者，力求其精。别集类中，凡两《唐书》、《宋史》所著录者，均予收录，注明其存佚情况；一人之诗文别集有多种版本者，择要收录。

(五) 名篇大类包括诗歌、词、文、赋、传奇五小类。因二十世纪出版之各种鉴赏辞典已多，本辞典收录力求其精，以省篇幅。

(六) 辛亥革命前，有关唐代文学之研究成果、参考书等，汗牛充栋，本辞典择要收录。

(七) 本辞典纪年：古代部分，凡有帝王年号者，一律用年号表示。作家之生、卒年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年代，并括注公元。辛亥革命以后，只用公元。

(八) 作家之籍贯、郡望、出生地，皆用当时地名，并括注今地名。遇古今地名相同者，仅括注今所属省、市或自治区名。其他漫游及仕宦所到之处，概不括注今地名，以免繁冗。

(九) 外国人于唐五代时曾寓居中国而以汉语写作者，酌予收录。

(十) 唐五代文学作品中涉及之典故、成语、胜迹，因已有专门辞典收录，为避免重复，本辞典不再收入。

(十一) 本辞典对歧异的文献记载，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或采用一说，或诸说并存。

(十二) 本辞典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对冷僻字，酌情括注汉语拼音。

(十三) 本辞典正文各类条目按笔画顺序编排，后附《词头首字索引》，以便检索。

(十四) 本辞典资料下限至民国(除敦煌文学)。辛亥革命后，学术界对唐史、唐代文学之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由传统学问走向近代学科，其内容不在本辞典收录范围，故不专立辞条。

(十五) 本辞典以白话文撰写，偶有文言文、古文、俗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均用直译，必要时加注释。

(十六) 本辞典以正楷字体书写，行款格式统一，每条目由“词头”、“释文”、“例证”三部分组成。

(十七) 本辞典以“条目”为基本单元，各条目之间以空行隔开，每条目由“词头”、“释文”、“例证”三部分组成。

(十八) 本辞典以“条目”为基本单元，各条目之间以空行隔开，每条目由“词头”、“释文”、“例证”三部分组成。

(十九) 本辞典以“条目”为基本单元，各条目之间以空行隔开，每条目由“词头”、“释文”、“例证”三部分组成。

(二十) 本辞典以“条目”为基本单元，各条目之间以空行隔开，每条目由“词头”、“释文”、“例证”三部分组成。

目 录

前言	1
凡例	1
分类总目	1
辞典正文	1—1141
索引	1143—1219
后记	1220

分类总目

- 总论 1
- 专论 19
- 群体流派 37
- 作家 53
- 著作 总集 487
 - 别集 523
 - 诗话 文论 笔记 杂著 613
 - 小说集 633
- 名篇 诗歌 643
 - 词 833
 - 文 849
 - 赋 879
 - 传奇 905
- 敦煌文学 (1) 专著 927 (2) 重要作品 959
- 民间歌谣谚语 991
- 曲名词牌 1003
- 体裁作法 1019
- 名词术语 1047
- 研究著作 1063
- 参考书 1121

1

总 论

【唐五代文】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光辉时期。唐五代散文（主干是唐文）远绍先秦两汉，“扬弃”三国两晋南北朝，成就是巨大的。首先是作者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单就清编《全唐文》所录而言，作者三千余人，与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大致相当；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多篇，其字数是唐以前全部文章总和的两倍多。如果加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所补收，其他典籍所录和晚近发现的唐人墓志等，其数量之巨，更非唐五代前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此时期的散文，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文体丰繁，风格多样，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更把唐代散文成就推向顶峰，使“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新唐书·文艺传》序），开启宋元明清散文之先河，并成为它们的典范。从这种意义上说，唐五代时期又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唐五代散文，就语言形式而言，可分散体和骈体两大类。由于这两类散文往往与一定的文学风尚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之间的消长变化也就反映出唐五代散文发展变化的轨迹。基于这一点，唐五代散文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现略述如下。

（一）骈体为主，文风文体开始变革阶段。唐王朝建立之初，文章“沿江左余风”，“绮句绘章”（并同上），骈俪浮艳，是其主要特色。当时文坛，以骈体散文为主。不但诏令、制诰、表疏、议对等公文用骈体，而且书、记、论、序等也大多如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如太宗时的魏徵、李百药、于志宁等，高宗、武后时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朱敬则等，都擅长于骈体散文。散文名篇如《论时政疏》、《十渐疏》、《请除释教疏》、《谏太子承乾书》、《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王勃集序》、《对蜀父老问》、《代李敬业讨武氏檄》、《陈后

主论》等，都是骈体。应当说，它们都是言之有物，文辞畅达的骈文佳作。其中有些还多少有点散体化的迹象。当然，它们与当时那些“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的文章比起来，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它们的出现却反映着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浮艳不实的文风开始受到冲击，骈体散文开始受到改造。这一新动向是唐初以来就已出现的改革浮艳文风的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随着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到了武后时期，陈子昂终于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中，标举“风雅”、“兴寄”，提倡诗歌革新。该文是针对“文章道弊五百年”而言，重点虽在诗歌，但实际上不能不关系到散文，从而也为散文革新指明了道路。而且，陈子昂在散文创作的实践方面，“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推动唐初以来的散文进一步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从魏徵、杨炯、陈子昂等人的主张和实践来看，他们所反对的是散文创作中的浮艳文风，而不是要摒弃骈体散文这种文体，不是要用散体来代替骈体。不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骈体散文事实上是浮艳文风的载体，要革新文风，势必不可不触动文体，淡化俳俪气息。所以，骈体散文本身的改革，骈体向散体转变的进程，随着文风改革的发展，也在发展着。与此同时，唐初以来就已存在的散体散文，也在随着文风改革的发展，逐步扩大其应用的领域，提高其艺术表现能力，增强其地位和影响。

（二）骈体向散体过渡阶段。玄宗开元年间，散文创作仍以骈体为主，但骈体散文文风文体的变革，在创作实践上进步颇为明显。绮靡之风减退，质实自然、骈散间行的作品渐多。号称“大手笔”的张说，所作为骈体散文。其中占很大比重的碑志，往往在质实、生动的叙写之中，杂以议论，刻画人物，寄寓褒贬，内

容沉实，气势雄浑；此类作品的语言，大多明白晓畅，较少雕饰，有的还骈散兼行，错落有致。被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新唐书·张九龄传》）的张九龄，他的一些敕书、书、序等，虽为骈体散文，但叙事、绘景、抒情、议论，情意真切，文辞平正自然，骈散间行，优美畅达。他的《敕金城公主书》（“岁月流易”），实际上已是散体散文。张说、张九龄的散文创作，典型地反映出当时骈体散文变革的实际。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年间，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相继崛起。他们自觉写作散体散文；同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文风文体的主张，要求文章应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内容充实，有益于“政教”，文辞质朴简洁，反对“俪偶章句”。他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却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散体代替骈体而成为散文的主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三）古文大兴，文风文体变革全面胜利阶段。德宗建中年间和贞元初期，骈文家陆贽所作奏议，指陈政事，深切精当，虽用骈体而不受拘束，自由畅达，脱尽浮靡之气，标志着骈体散文的改造取得重大进展。可以说，唐代骈体散文的变革，至陆贽而登峰造极。接着，贞元初期以后，韩愈、柳宗元、欧阳詹、李观、刘禹锡、张籍、白居易、吕温、吴武陵、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相继登上文坛。在韩愈、柳宗元的领导和影响下，在众多散文家的参与之下，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这场运动，打着“复古”的旗号，以推行儒道为目的，以大力提倡和写作“古文”（实际是古已有之的散体散文在当时的特定称呼）为手段，积极从事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变革。这一运动，主要酝酿于玄宗至代宗时期，正式兴起于贞元年间，至宪宗元和年间而达到高峰，以长庆四年（824）韩愈去世而告一段落。古文运动在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散体终于取代骈体而成为

散文创作的主流，为唐以后的古代散文创作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榜样。经过宋代古文家的进一步努力，唐宋古文的传统代代相传，支配着文坛将近一千年，影响是深远的。（“唐代古文运动”，本书另有专论，故本文不予详论。）

四（四）散体大行，骈体反振阶段。晚唐五代时期的散文，上承古文运动的余威，散体进一步流行和发展。晚唐前期，仍然健在的“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以及在古文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李德裕、刘轲、舒元舆、刘蕡、杜牧等，积极写作散体散文，使散体散文功能和应用领域进一步增强和扩大。但是，在皇甫湜等人的倡导之下，韩愈文风中崇尚奇尚怪的一面得到发扬。这不但对散体散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而且给骈体散文的重新振起以可乘之机。加上骈体散文根基仍在而社会思潮又给予影响，这样，在元和年间就已闻名的骈文家令狐楚的培养之下，李商隐从文宗大和年间开始，大量写作骈体散文，成为晚唐杰出的骈文家。同时之温庭筠、段成式等也都致力于骈体散文写作。一时之间，骈体散文呈现抬头之势。晚唐后期和五代时期，名声较著或存文较多的散文作者之中，吴融、钱珝、胡曾、顾云、乐朋龟、薛廷珪、杜光庭、陈致雍、徐铉、徐锴等多骈体，而且集中于制、议、启、表等类；刘蜕、孙樵、皮日休、陆龟蒙、李磥、司空图、孙邵、程晏、黄滔、牛希济、杨夔、沈颜、罗隐等多散体，特别是皮、陆、罗等所写的小品，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现实性，以及较高的文学价值，发展了古文运动的成就，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誉之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这种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骈、散两体尽管各有自己的作者和阵地，有时看来似乎旗鼓相当，但散体的实力和实绩，事实上是骈体难以比拟的。参清董诰等编《全唐文》、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今人吴钢等编《全唐文补遗》等。（乔长阜）

【唐五代词】词，诞生于“胡夷里巷”，是配合燕乐曲调喉之歌喉、被之管弦的音乐文学。唐五代是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部唐五代词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一) 敦煌曲子歌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发现了大宗写卷，其中存有曲子歌辞二百余首。这些曲子歌辞取材广泛，思想内容丰富。唐代边患迭起，征战频繁。因此，有不少歌辞写边塞生活情事。《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抒写将士慷慨报国的豪情壮采；《凤归云》(“征夫数载”、“绿窗独坐”)、《宫春怨》(“柳条垂处”)等，用独处深闺的少妇口吻倾诉对征夫的思念、盼望以至怨愁，传达出广大人民息边尘、罢远征的强烈愿望。而为数更多的是以爱情婚姻为题材，敞开青年男女心灵的窗扉，展示其爱情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篇章，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少女失恋或婚变的哀歌。《望江南》(“天上月”)、《南歌子》(“悔嫁风流婿”)抒写闺中少妇对荡子的谴责和郁愤；《天仙子》(“燕语莺啼”)、《抛球乐》(“珠泪纷纷”)倾吐少女受骗上当、追悔莫及而又无可告诉的创痛；《望江南》(“莫攀我”)更是直接发自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不甘凌辱的呼喊。至如《竹枝子》(“高卷朱帘”)那样“潘郎”表露对二八“萧娘”一见倾心、热切追求的欢快歌唱，则是仅见的篇章。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态。《谒金门》(“长伏气”)，高唱“闻道君王诏旨，服裹琴书欢喜，得谒金门朝帝庭，不辞千万里”，它和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活现出唐代走“终南捷径”的士子“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特殊心态。而《浣溪沙》(“卷却诗书”)所宣泄的，则是对“时世厌良贤”的愤懑和抗议，大抵是李唐统治由清明转向昏暗以后所作，下开宋代隐逸词的先河。还有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菩萨蛮》(“敦煌古往”)、《酒泉子》(“每见惶惶”)、《献忠心》(“自从黄巢”)、《望江南》(“曹公德”)等，虽非一时一地一人

所作，散而无统却自成系列，反映出李唐王朝从如日中天转而日薄西山以至回光返照的种种情景，具有不朽的文献价值。总之，敦煌写本曲子举凡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逸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至如“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_日齐拜圣颜”等句，直是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绝非花间词人所能道出者。较为完整而有系统地保存早期曲子风貌的《云谣集杂曲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集。词有专集显示出此种新兴文体扎根群众，规模粗具。敦煌曲子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写作时间盖始自七世纪中期下迄十世纪四十年代，上下几及三百年。其语言通俗易懂，表情坦率自然，风格清新爽朗；长于铺叙，缘事言情，触类引发，富于生活气息；不为格律所囿，随意用衬，以方言叶韵。由此可见处于草创阶段流行民间的词，比之后起者留有较多的自由驰骋的余地。此外，《南歌子》(“斜倚朱帘”、“自从君去”)、《定风波》(“攻书学剑”、“征战偻俛”)属联章体。联章对答不仅可以弥补曲子篇幅短小限制表情达意的缺陷，利于情节的展开；而且一问一答，针锋相对，妙趣横生，又可以活跃气氛，提高演唱效果。

(二)诗客曲子词。燕乐曲调由胡夷里巷初入宫廷、市井，乐工们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现成歌辞，只能以流传人口的诗句勉强凑合，应付临时演唱的需要。文人制词首推李白。其《菩萨蛮》(“平林漠漠”)和《忆秦娥》(“箫声咽”)二阙，宋人黄昇《花庵词选》誉之为“百代词曲之祖”。中唐以后，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日益盛行，从此文人词继李白之后，由宫廷走向广阔社会。刘禹锡《忆江南》“依曲拍为句”，标志着词体确立的开端。中唐文人以词唱和已蔚然成风，题材范围也日趋广泛。晚唐是唐词发展的重要时期，词的专业作家和

专集也涌现出来。温庭筠独步词坛，成了第一位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专业作家。晚唐有才华和独创精神的词人，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使词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风貌。题材内容从此集中到表现男女之情和抒发个人情怀方面。词与诗在艺术特征上的区别也日趋明显了。至半死不尚，昔时苏轼曾言其：断句早五代时，广袤的中原地区成了军阀角逐之所。半个世纪内，群雄割据，互相火并，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以致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州县丘墟，疮痍满目，惨不忍睹。偏安一隅的南方九个政权，攻伐较少，成了安定的绿洲，生产继续有所发展，尤其是地处长江上游、下游的西蜀、南唐，为词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土壤。自微益同知其事，业已各具得其(三)西蜀词。以《花间集》为代表。《花间集》结集于西蜀，是我国第一部诗客曲子词集。选录温庭筠以下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大都为五代蜀人或流寓入蜀者。其所作词多写女人、相思，也不乏内容新颖别致、格调清新之作。温庭筠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菩萨蛮》十四首是代表作。其抒写闺妇愁苦之词，未必全无隐寓自身沉沦失落之感。其词向以秾丽著称，而《更漏子》、《望江南》诸阙，却以流丽取胜。就总体而言，温词多客观描摹，温馥绮丽，技巧精湛，风神别具。为应歌而作，对词律坚守不渝，讲究四声平仄，抑扬有致，曲尽其妙。又好选用《河传》、《荷叶杯》、《诉衷情》一类词调，促节繁音，韵律转换频数，旋律复杂多变，富于节奏感。温词上播宫廷，流传饮席，远及边陲。所用词调多达十九个，其中有些还属首创。对加速词体格律化的进程，温庭筠功不可没，宜为花间词人鼻祖。当然，其刻意求工，雕绘满眼，以至人物仪态风神有时反被金碧辉煌的珍丽物色所掩，已早为人所诟病。比温庭筠晚出的韦庄，是五代词坛巨擘。所作词也以写女人、相思为多，但多倾注

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谒金门》(“空相忆”)、《荷叶杯》(“绝代佳人”、“记得那年”)、《小重山》(“一闭昭阳”)以及《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诸阙分明为怀念睽隔久远的旧欢而作，情辞凄苦，催人泪下。其间倾注着词人自身飘零之感，颤动着感伤时世的灵魂。与一般代人立言，抒写缱绻风情、离愁别恨之作，判然有别。韦庄长期宦游江南，受南方乐曲民歌的熏陶，所作歌词风格疏淡，与刘禹锡、白居易比较接近，而有别于温词。温词往往在一首乃至半阙之中叙写几件事或含有几层意蕴，简直“密不容针”；而韦词一首一事一意，甚至如《菩萨蛮》、《女冠子》诸阙，采用联章体合写一件情事或抒发一时感受，可谓“疏可走马”。直用赋体，不假比兴，一气流注，笔致爽朗，倍感亲切动人。《女冠子》、《定西番》，词与调别，一反缘题而赋的传统作派，透露出词由应歌而作重新回归抒情化道路的消息。这对提高词的地位是个可喜的朕兆。花间词人中，影响仅次于温、韦的，是荆南词人孙光宪。存词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居花间词人之首。光宪雅善小词，工丽绵密，矫健爽朗，别开生面。其《浣溪沙》九首，或用递增手法借空濛意象抒写依依惜别之情、描状令人倾倒的绰约风姿；或摄取某一光彩照人的镜头，留下迷人的倩影；或写幽闭深闺的少女伤春难禁的情怀、羞怯待客的神情举止，刻画传神，风韵可想。《谒金门》(“留不得”)代闺妇抒发爱深恨切的怨情，造语峭劲，含思深永。以淡笔短制展示南国水乡景物和风俗画面，尤为见长。《风流子》(“茅舍槿篱”)，声色并茂，饶有乡土气息。下开宋代苏、辛农村词的先声。存词赋咏本调，就题发挥者近三十首，大都意到笔随，舒卷自如。其《河传》(“太平天子”)铺陈隋炀帝乘兴南游，导致“烧空，魂迷大业中”；《后庭花》(“石城依旧”)感叹陈宫黍离，造语精警，深隐含蓄。结合词人谏止南平王高从诲豪奢逸乐之事，似寓以古鉴今之意，弥足珍视。孙光宪的突出

成就在于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宋代张先、贺铸小词的警健处往往得力于孙词。此外，欧阳炯和李珣，并以善于描画南国风物著称。炯为《花间集》作序，也曾写过艳词之最《浣溪沙》（“相见无言”）。但所作《南乡子》八首，语意工妙，质而不俚，格调明快，情趣盎然。陆游以为“高胜不减梦得《竹枝》”（《徐大用乐府序》）。《江城子》（“晚日金陵”），俯仰古今，纵横驰骤，隐含逸乐难以久恃的潜在忧患意识。它与李白《苏台怀古》旨趣略同，而意象更为衰飒。李珣亦有《南乡子》十七首，内容系展现南国风土人情，率皆洗净铅华，富于诗情画意，画面轻灵美妙，洋溢着青春气息，与《花间》其它诸作迥乎异趣。《渔歌子》（“荻花秋”、“九疑山”）、《河传》（“去去”）、《定风波》（“志在烟霞”、“雁过秋空”）等反复抒写“轻爵禄，慕玄虚”的情趣，表露与世无争、自甘岑寂的心绪，洒然高逸，耐人涵咏，下开北宋人诗格。他如《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辞与调合，保持早期词特色，构思别致，含思凄绝，语浅情深，寄意幽邃，也是成功之作。从格调看，应是浪迹江湖时所作。

《花间》其余各家，在题材的开拓或艺术技巧方面，亦间有可取之处。如毛文锡《甘州遍》（“秋风紧”）以后唐对奚战争为背景，描写边塞的寒苦与将士浴血御敌的悲壮场面，真切感人，为宋代边塞词导夫先路；鹿虔辰《临江仙》（“金锁重门”）和毛熙震《后庭花》（“莺啼燕语”）极写故宫黍离，感慨今昔，造语新警而不为儇薄，发声清越，催人猛省。此外，如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薛昭蕴《浣溪沙》（“红蓼渡头”、“粉上依稀”）和《离别难》（“宝马晓鞴”）、牛峤《西溪子》（“捍拨双盘”）、牛希济《生查子》（“春山烟欲收”、“新月曲如眉”）、张泌《浣溪沙》（“马上凝情”）和《蝴蝶儿》、和凝《春光好》（“蘋叶软”）、顾夐《诉衷情》（“永夜抛人”）、魏承班《生查子》（“烟雨晚晴天”）、阎选《河传》、尹鹗《菩萨蛮》、毛熙震《清平乐》等，各擅所长。其创作经验可

资借鉴。
从总的倾向看，《花间》词人大多为应歌而作。为适应歌唱时的环境气氛，又切合歌妓的身份口气，写景一般不出园亭，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崇尚藻饰，充溢着相当浓重的富贵气、脂粉气。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流宕若此，诚不可取；但与同时代日形卑弱的诗风相比，《花间》词毕竟有其“简古可爱”的一面。

南唐词。比《花间》词晚出，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冯延巳工诗，尤喜为乐府词，存词百余首。传词之多居唐五代词人之首。有《阳春集》。陈世修有序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可知冯词也为应歌而作。以抒写女子闺思伤别者居多，与《花间》词相比，冯词尤侧重于探索和表露人物心灵的奥秘。也有些词忧生念乱、俯仰身世，时或寄寓着自己难以排遣的危苦烦乱之情，如《鹊踏枝》：“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入归后。”《采桑子》：“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凭杖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词里隐含着有感于好景难驻油然而生的郁伊惝恍、惘然自失而又无由解脱的烦恼和忧伤。冯词长于即物起兴，以景托情，曲折层深，含思凄婉。词风清新流丽，委婉情深。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和泪试严妆”喻指冯延巳词品，谓其“深美闳约”，“堂庑特大”。论其影响，可与温庭筠、韦庄三分鼎足。北宋“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南宋名家也沾丐膏馥，辄臻上乘。又如李璟存词仅四首，于绮艳中寓沉郁之致。其哀婉之至，为工于怨词的后主所不及。李煜，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早年所作无非叙写君臣欢歌狂舞、醉生梦死的宫廷生活以及与小周后偷期密约的艳情韵事，与《花间》词初无二致。开宝四年（971）以后，宋王朝对他的威胁与日俱增，燕巢危幕，祸在旦夕，作为

歌辞遂转向抒发国难家愁给他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名状的精神负担。代表作《清平乐》(“别来春半”)怀人念远,忧思难禁。结穴以寸接天涯的绵芊芳草为喻,倾诉其旋生旋灭的离愁别恨,设譬新颖而又贴切。及至金陵陷落,被遣入北,沦为阶下囚后,更是郁郁不乐,“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见乎词语,尽在抒发其对“往事”、“故国”的眷恋和不甘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情怀。诸如“往事已成空”、“往事只堪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问君能有几多愁”、“人生愁恨何能免”、“多少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词句、字眼,几乎触处可见。其间无不烙有“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后主所特有的胎记。它们虽然曾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一些失去美好生活者的共鸣,但终缺乏激起人们奋发进取的力量。李煜词——特别是后期所作,在艺术上取得了超迈前人的独特成就。直白抒情,不假兴寄;纯用白描,不事藻饰;造语自然,音律谐婉。他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虞美人》(“春花秋月”)、《破阵子》(“四十年来”)、《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帘外雨潺潺”)等,都是脍炙人口、至今传诵未替的不朽之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恰当而形象地指出了温庭筠、韦庄和李煜三家词不同的风貌。其时,品同晏总的说来,南唐词是冯延巳、李璟、李煜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先是在火山上跳舞然后又在火海中忍受煎熬、苦苦挣扎的产物。如果说,晚唐五代忧患意识在花间词里还只是不易为人觉察的潜流,那么到南唐词人笔下不仅已溢出地面,而且迅猛异常地由涓涓细流汇成了滔滔一往的大河。凡此在三家词里灼然可见,而李煜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除了时代因素外,跟他们身居显位和每况愈下的处境有关。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谓: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把词由应歌而作重新纳入抒情的轨道,使词成为抒发情性的工具,从而提高词的地位,在这方面,继韦庄、冯延巳以后,李煜的功劳最大。李煜是唐五代最后一位词人,时代和身世造就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词人。《梦窗集》卷之三(黄进德)

【唐五代诗】 唐五代是中国古典诗歌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五代诗(主干为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典诗歌的高峰。唐五代三百四十二年中,流传至今的诗篇,多达五万三千余首,其中五、七言诗占绝大多数,名篇佳什在千首以上。这些诗歌的作者,有二千多人,遍布于社会各阶层的男女老幼之中,而以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的文人为主体。他们中间,曾经著录有别集的将近七百家,存诗一卷以上的将近二百五十人,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不下百人,所形成的影响较大的流派不下十个。他们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深厚,体制完备,技法高超,语言精美,声韵和畅,诗意浓厚,风格多样,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总体上说,其水平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朝代,而与汉赋、宋词、元曲相并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为优秀的代表。唐五代诗歌的发展,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五代四个时期。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712)这九十四年为初唐,是五、七言古体发展,律体确立,刚健清新诗风逐步建立并取代浮艳颓靡诗风的时期。唐王朝建立之初,“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杜甫传赞》),宫廷诗充斥诗坛,“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为其代表。但同时,也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个别诗人于浮靡风习之外别树一帜,显示着新的诗风正在萌生。高宗和武后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陆续登上诗坛。王、杨、卢、骆等不满于唐初以来“绮碎”诗风,思革其弊,主张建立“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

而弥坚”(杨炯《王勃集序》)的新诗风,积极写作五言律、绝和乐府歌行,描绘山川风物、市井边塞、宦游军旅等,直写胸臆或咏古讽今,表现其积极进取精神和愤懑不平的情怀,其内容和风格,与宫廷诗相比,都大为改观。沈、宋等擅长五律,也有一些突破宫廷诗藩篱的好诗。经过“四杰”和沈、宋等的努力,唐初以来的浮靡诗风得到了改造,刚健清新的诗风开始形成;五言古体进一步发展,七言古体得以完善,五、七言律、绝得以定型。“四杰”以后,与沈、宋约略同时的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提倡“汉魏风骨”,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的齐梁诗风,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在创作实践方面,他的诗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为主要内容,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形成了矫健超拔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浮靡诗风得以廓清,刚健清新的诗风终于取而代之。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唐五代诗终于迈进了生命力最为旺盛、成就最为辉煌的盛唐时期。盛唐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体制大备,艺术精湛,异彩纷呈,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超越前代而臻于唐五代诗之顶峰。所谓盛唐,通常是指唐玄宗和唐肃宗在位的这五十年。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的“盛世”和社会动乱的酝酿时期。现实生活激发了诗人们入仕从军以报国立功、济世安民的豪情壮志,也相应地激起了他们思想感情上得意与失意、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们的作品富于理想和追求,饱含热烈深厚的情意,散发出强烈的浪漫气息,表现出清新自然、雄健高华、兴象超妙、声律圆畅的艺术特色,形成了“盛唐气象”。在这些诗人中,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以咏写边塞从军著称,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以描绘山水田园知名,后人分别称之为边塞诗派(或高岑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或王孟诗派)。边塞诗派固然集中反映了盛唐的积极进取精神,

山水田园诗派也表现出对理想境界和美好品格的向往追求。两派诗人各有其特色和成就,但其作品的题材、风格又并非是单一的,一派诗人往往又兼有另一派之所长。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边塞从军、山水田园之外也有所建树。两派之外,张说、张九龄等也都卓然名家。而此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当推李白。李白诗歌多方面地反映了唐王朝盛极将衰的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心理,突出地表现出追求个人的理想和自由,憎恶丑恶和黑暗现实,蔑视权贵和礼法的精神,感情奔放炽热,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飘逸豪放,代表着唐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白是屈原以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杰出诗人一道,成就了初唐即已开始的诗歌革新的伟业,开创了唐诗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而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结束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乱,则给这种繁荣横添了新的刺激,并使它转向新的领域。动乱开始,大多数诗人感到痛苦、迷茫,接着消沉、感伤,而且他们一时又难适应这种客观现实的变化,所以,他们虽然也写过一些反映动乱的作品,为盛唐诗歌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但写得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和情趣,发展了开元、天宝时期形成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风。也有一些诗人,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充分反映战乱发生后的社会现实,改变了开元、天宝时期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倾向。其中最为优秀的是杜甫。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去观察和反映现实,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又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平定战乱、济世安民的决心和信念。他在动乱时代丰富和发展了盛唐精神。而在艺术上,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系铭》),也将盛唐诗歌推向新的高峰。杜甫诗歌代表着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诗歌和李白诗歌,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